

# 北京市基礎教育改革中的 政治衝突 (1954-1966)

• 曹子尼、董國強

**摘要：**1966年夏天爆發的文化大革命，與持續多年、旨在整肅與重塑國家意識形態的狹義「文化革命」有着緊密的內在關聯，大、中、小學的教育改革是其中的重要內容之一。本文側重考察北京市基礎教育改革問題在中共幹部群體內部引發的爭議與衝突。〈關於提高北京市中小學教育質量的決定〉（〈五四決定〉）是北京市委在1954年制定的關於教育改革的綱領性文件。圍繞該決定的長期黨內紛爭主要涉及中央教育部官員、北京市委及市教育主管部門領導人、北京市各中學負責人三個群體。這些紛爭一方面折射出不同幹部群體對「全面發展的教育方針」的不同理解，另一方面也凸顯了在一元化領導體制下黨的系統與政府系統、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權屬糾葛。〈五四決定〉在文革前夕遭到徹底否定，表明在基礎教育改革實踐中，務實考量最終被政治目標壓倒，經驗理性最終被意識形態偏見取代。

**關鍵詞：**北京市委 〈五四決定〉 教育改革 政治衝突 文化大革命

1949年中共建政後，一直積極致力於通過國家意識形態的整肅與重塑來捍衛新政權的政治合法性，而中小學教育是向青少年灌輸新的國家意識形態、培養「革命接班人」的重要途徑之一。因此，整個基礎教育系統被置於黨的一元化領導之下，絕大多數中小學由黨員幹部擔任主要負責人，在教育方針、課程設置、教學內容和教學方式等方面也有一些「革命化」的配套措施。然而，中小學教育是一個十分複雜的系統工程，擔負着多種不同的社會職能，同時也受到諸多客觀因素的制約。從1950年代初期至60年代中期中共政權多次提出並實施所謂「教學改革」或「教育革命」不難看出，當局對中小學教育的強力干預一方面實現了一些既定目標，另一方面也衍生出一些始料不及的問題，甚至還引發了一些政治衝突——其中最突出的無疑是文化大革命初

期，全國各地中小學生紛紛以批判「資產階級教育路線」為名，向黨組織任命的學校領導層發起猛烈攻擊。

早在上世紀70、80年代，西方學者就對上述悖論的成因進行了較為宏觀的探討，初步揭示了當代中國基礎教育與國家政治干預之間的複雜互動關係<sup>①</sup>。自上世紀末起，中國學者也開始涉足這方面的研究，進一步闡述了大躍進（1958）、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63-1965）和文革（1966-1976）期間「教育革命」對中小學教育造成的種種影響<sup>②</sup>。還有一些中英文論著以廣州、北京等地為考察重點，進行了較為細緻深入的微觀實證研究<sup>③</sup>。概而言之，上述論著的研究靈感大多源於文革初期的戲劇性衝突，着重考察中小學生群體的造反動機和派性起源，強調中共政權長期以來大力灌輸「階級鬥爭」觀念對青少年群體的影響。

不過本文的研究發現，在文革初期受到批判的許多教育改革措施，應該追溯到1954年出台的〈中國共產黨北京市委員會關於提高北京市中小學教育質量的決定〉（〈五四決定〉）。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決定自出台以後就紛爭不斷，捲入紛爭的主要有中央教育部官員、北京市委和市教育局（市委教育部和市教育局）負責人，以及北京市各中學校長三個群體。各方的爭執既涉及一些具體措施的得失，也涉及一些較為抽象的意識形態問題——主要包括如何理解「黨的一元化領導」、「全面發展的教育方針」和「階級鬥爭」等概念。這些爭論往往以激烈的政治衝突告終，隨後又在新的歷史語境下死灰復燃。圍繞基礎教育問題的紛爭不僅發生於中學校園，還發生於中共官僚體制內部，而且其複雜成因和激烈程度遠遠超乎我們的預料。

本文主要依據檔案資料和其他歷史文獻，論述北京市委〈五四決定〉是在甚麼情況下出台的？它包含哪些具體內容和配套措施？如何因應政治形勢的變化而不斷調整其側重和修辭？圍繞基礎教育改革的一些意見分歧如何逐步升級為政治衝突？北京市的基礎教育改革最終以何種方式結束？這樣的終結對中國的基礎教育帶來甚麼影響？

## 一 〈五四決定〉的出台及實施

1949年中共接管北平時，該市只有15所公立中學、61所私立中學、235所公立小學以及121所私立小學；在校學生數量約為16萬（另有10多萬學齡青少年因貧困和戰亂無法入學）。全市中小學教職員僅有6,000名，不僅數量上嚴重短缺，而且工資水平很低，難以維持生計<sup>④</sup>。中共政權最初只接管了公立中小學，並試圖通過強化校舍管理、規定學生錄取和考核標準、控制教育資源等措施，肅清「國民黨遺留下來的殘餘毒素」<sup>⑤</sup>。但因各校專任教師和管理幹部數量嚴重不足，教學和管理水平十分低下，當局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沿襲民國時期的學制和教制。與此同時，為數眾多的私立中小學基本處於放任自流狀態。